

李淑霞 著



王安忆

小说创作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山东交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出版

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

李淑霞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李淑霞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1125-159-3

I. 王… II. 李… III. 王安忆—小说—文学评论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14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huazhang_china@hotmail.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张 华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4 mm×215 mm	
印 张	8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序

朱德发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文学家,无不以其卓越的艺术智慧与勤奋的创造潜能,为艺术的精益求精而坚持不懈地探索,遵循美的规律营构独树一帜的艺术王国。王安忆是女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也是现代中国作家总体队伍中的耀目明星,随着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关注和学术研究的介入,对她的星散评论已纳入系统研究轨道,也由中国文苑逐步走向世界文坛。对于这样一位可以经典化的作家及其作品,检视国内外研究现状则可发现,随机评论较多,某个文本或某一特点探讨较多,而对其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与全程性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这种状况不迅速扭转,既不利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及文学史的重构,更不利于将我国的著名作家作品不失时机地推上世界舞台而进行全球化的学术交流。李淑霞博士的专著《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选取了特定的学术视野、形成了独特的逻辑理路,完全从对小说文本的阅读感受与心灵体验出发,多维度多层面地探析了王安忆小说艺术王国的文化意蕴、人性内涵、审美特质以及创作规律,构成了既富创新性又具科学性的系统学术话语,从整体性与全程性的纵横捭阖研究上将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这不仅填补了王安忆小说研究的薄弱环节,也为强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增进了新的价值内涵和拓展了新的学术论域。

王安忆营造的小说艺术王国,瑰丽多姿,丰实精深,以此作为专著的研究对象,对于论者主体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不只因为王氏小说创作多产和多变难以把握,而且其艺术时空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与美学因素也

为见仁见智提供了多种判断的可能性,特别王氏小说文本的解读与评论向来纷纭无定;所以这就给本书的突破与创新并形成一家之言设下了必攻之关,只有凭借研究者的灵气与才智攻下一道道关,方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进而开拓学术新境界。

现代不少的小说家缺乏理论兴趣,主要借助人生经验或生活感受或艺术冲动进行小说创作,直至成名成家也不晓得小说在理论上如何界定;也有些小说家是理论先行而创作在后,即非常重视对小说理论的研究及其导向作用,按图索骥,有什么小说观就创作什么小说文本。然而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既没有流入经验主义又没有盲从小说教程,乃是通过创作实践来体悟小说奥妙又以既成小说观念规约创作实践,并以创作实践丰富更新小说观念,从而形成了独有的小说美学。可取的是本书精辟地论述了王氏小说的创作实践与其小说观念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以及小说美学的独特内涵,既发现了王安忆对小说创作与自我经验关系的理解即不仅看到前者之于后者的依赖与超越,也看到了以自我经验进行自我表现;既发现了王安忆对小说创作真实性与虚构性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又发现了王氏对小说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一元论的独特理解,这就形成了王安忆别具理论色彩的带有中庸主义哲学意味的小说美学,使之成为小说创作本体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没有游离于专著的整体逻辑结构之外,而且小说美学的深度阐释又为小说创作文本的具体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互文参照。

小说创作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与永恒的理性启迪,关键取决于小说主题意蕴的原创性与深广度;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虽然具有多变性,但是万变不离其“生存意义追问”、“人生困境突围”和“女性生命体认”三大母题,而这三大母题也正是其小说的重要思想价值和普适文化意义所在。本书对这三大主题意蕴的洞察是慧眼独具的,并未停留于泛泛的人所共知的思想意义的考析上,而是从特定的角度切入,透过经验层面尽力去发现其形上层次的哲学意义或深潜的生命意识以及那些带有原创性的独特见识。从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中,不只发现了创作主体及人物“不懈的生存意义追问”而陷入迷茫甚至虚无之境,更发现了其奋力反抗

与拯救的种种方式,特别是蕴涵于日常生活中的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平民精神给予人们的自救以坚韧的生存意志与旺盛的生命力量;不只发现了现代人与现实之间存有的悖论关系隐喻着一种深刻的人类生存困境,更发现了王安忆在小说中是以平静、从容和温婉的态度对人生困境进行揭示、质疑和批判;尤其发现了王安忆凭依自己作为女性叙事者所拥有的丰盈生命体验来探究女性作为生命主体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出既不同于男作家又别于女权主义作家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观念,建立了一种新的以女性为主体、突出女性价值的两性关系模式,这就为中国女性喻示出一条既非中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又非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第三条道路,这同样是作者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女性文化想象。论者对从王氏小说主题意蕴中的有所发现而给出的理性概括,是以生命化入文本世界去感受随后又将生命化出文本世界且立足于生存哲学或女权主义的认知高度去体悟的,致使那些具有逻辑威力的理性分析始终与文本的感性具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深邃丰实的主题内涵得到纲举目张的彰显,可以收到情感动人、理性启人的双赢效果。

王安忆富有诗性哲意的小说文本世界是由艺术语言建筑起来的,正如本书所概述的那样,“凭助于语言写作活动,她把那些个人化的、瞬间性的,可以感觉但不可重复的经验凝固在纸上的文字中,烛照了生命和世界的深幽之处,使自身的生命得到灿烂的盛开和丰富的展示,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展开的存在。”既然小说创作是王氏依凭语言作为特殊生存方式来抒写自己的生命春秋,那么不论评论界或学术界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都不能忽略或淡化其语言特点的探赜发微的探索,理解了小说语言特点就是理解了小说文本的独特世界,把握了小说语言特点就是把握了王安忆生存的诗意方式。本论著对王安忆小说语言特点的探讨下了既深且细的功夫,这是对王安忆小说整体性研究而言在重要维度上的突进与深化,从小说文本的细读中论者不仅发现了王氏二十多年的小说艺术语言随着自身生命存在的展开形成“一条显在的变化轨迹”,而且也发现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轨迹所呈现出的各自差异互见的语言特点,这反映出论者对小说语言感悟的敏锐和对生命存在体察的深切。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至80年代末王安忆小说的描述性的具体化语言中,论者发现了王氏小说语言基本上是传统的描述性的具体性语言,表现出简洁明快、纯净清新、富有诗情画意的特点,而这种语言特点正与王氏这一时期自身生命的存在状态相契合。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长恨歌》的创作,论者发现王安忆潜心于以独特的小说语言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心灵世界,由天真单纯的语言阶段发展到语言意识的充分自觉阶段,并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即一种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这种语言则表现出繁复缠绕、细致绵密、曲折深幽的特点,而这三大特点主要体现于对人物对话所作的叙述性的转化与处理上、大量地运用比喻句式上和频繁地穿插主观议论上。论者结合小说文本的典型例证所作的丝丝入扣、准确深微的分析,提出不少颇有新意的见解,升华了王安忆小说语言的独创性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形成了王安忆小说语言变化的第三阶段,在论者的动态研究视野中又发现了王氏小说语言的新特点,即叙述性的具体化语言,呈现出一种平白如话、自然朴素、语淡意远的风格,这标志着王安忆的小说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验、思考和感悟密切相关,“她的成功不在于她是一个成功的作家,而在于她接受了自己”,而小说语言的语淡意远的风格正是王氏接受自己生命情感和存在方式之后心境的映射。可取的是,本书不仅发现了王安忆小说语言的新特点,重要的是透过语言特点发现了王安忆生命个体的演化而带来的艺术个性的成熟,故在洞察王安忆小说语言流变轨迹的同时更深切地体验并描述出王氏生命的律动,把研究小说语言与探察个体生命有机结合既是本书的独特视角又是其深刻性所在。

缺乏美感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是无法立足的,而小说的美感并不仅仅源于其形式美,它主要来自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因此本著作在探察了王安忆小说的主题价值内涵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语言风格之后,顺理成章地便以动态视角考析了其小说美学特征的嬗变轨迹,几近小说语言特点的流变也显示出三个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分度的逻辑阶段,即初期的美学特征是以“清纯明丽”为格调的近距离的性情抒

写,中期是以“深沉凝重”为格调的有限距离的理性求索,近期是以“平和温婉”为格调的远距离的审美观照。也许这样概述王安忆小说的总体美学特征有粗疏之感,然而这又是宏观把握难以避免的;可贵的是论著紧扣文本的精细分析,从切实的审美感受中抽绎美学特征,又将美学特征的抽象概括与文本体验相黏合,既避免了泛泛而论又避免了琐碎考证;并且把小说美学特征的形成及其变化与创作主体思想意识、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演变联系起来考察与探析,这更增强了对小说美学特征论述的深度。

本书遵循既定的逻辑理路从小说美学观念、小说主题意蕴、小说语言艺术、小说美学特征等四大维度,对王安忆其人其文作了整体性地过程性地深入探索与阐释,比起已有的研究著述来显得更加系统化和完整化,并在学术观点上有新的发现、新的概括和新的诠释;然而本著作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此,还体现于它对王安忆小说创作取得重大成功的内在规律和新鲜经验的总结上。在论者看来,“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成功,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她真诚的献身精神和中庸的创作的哲学”,并且“以其真诚的情感和中庸的哲学,塑造出完美的自我形象,展示给读者,以达到和读者的交流,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王安忆自我形象所体现出的这种中庸主义的道德哲学正合乎杜维明对中庸哲学的现代性诠释,即:“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规范,它既意味着内心情感的真实性与本真性,又意味着以自我心性为核心展现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样的“诚”必然要求作家做一个真诚的人,必须有意识地竭尽诚心去默察内心所发出的真声音,借以体认自身内在的独特性以及人类群体的共有性;王安忆以这种“诚”的中庸精神塑造自我人格来努力营造既是个性化的又具人类性的小说文本,“她牺牲了生命中许多世俗的欢乐,成就了自己在小说创作层面的成功和辉煌”。由于王安忆在小说文本中塑造的完美统一的自我形象源于其中庸主义的创作哲学,所以她的小说创作不论表现出的人生观、世界观、社会现实或者文学传统、文学潮流、意识形态等问题,都流出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哲学取向。基于这种理解与把握,论者为全书的逻辑结构预设了“中庸创作哲学”这条中心思想线索,

不论对小说观念所作的诠释或对小说主题、语言与美学特征所展开的论述,都要归结到“中庸哲学”,即中庸哲学既是王安忆自我形象之魂又是其小说创作之魂,这是她创作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秘诀又是其小说创作获得的最新鲜经验。本书为了论证这一重要见解的正确性,除了对王安忆其人其文从中庸哲学的角度进行了细微的探索与竭力的阐释外,还多次引用杜维明对中庸哲学的现代性诠释以证之,求得能够自圆其说。杜氏认为,“中庸之道”是一个动态的、含有扩张性的哲学范畴,具有独立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特性;它意味着一种绝对不受外界干扰的心灵状态,坚持自己的正确认识,不苟同任何一方的片面性,以达到对人生真理的完满认识和把握;它不做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是具有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气魄,努力将一些看似不相容的因素协调在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系之内,以实现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的多元共生性;它的目的是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复杂的时空网络中,取得最好的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它要在一个变幻无常、非常不容易掌握的情势下,在一个最复杂的时空交汇点上,照察各种不同层面的矛盾,协同各种不同性质的因素,找到一条最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它要在某一特定时空内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最和谐、最融通、最完善的安排;中庸哲学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价值与现代意义无不体现于王安忆的思想灵魂及其小说创作中。如果说本专著对王安忆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有诸多新发现和创新点,那么对“中庸创作哲学”的发现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对其所作的理论阐释也是最重要的创新点;若是你认同这一重要发现与创新点,无疑你会认为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要是你不同意这一重要发现或对其创新点有所质疑,那你也会敬佩论者的锐意探索勇气与敢于创新精神,或者从中获得一些深化王安忆其人其文研究的理性启示和“问题意识”。

淑霞博士的这本专著对王安忆小说创作所作出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勘探,之所以有所发现有所深化有所出新,固然原因多多,但是在我看来,一是得力于她能在小说文本的解读上下深功夫与细功夫,充分相信自己的阅读感受与心灵体验,以女学者独有的期待视野去洞察女性作家

对存在、生命乃至外宇宙的独特感悟，能够在想象的艺术世界里进行灵犀相通的交流与对话，既可以穿越人生的时空隧道去破译生命密码，又能透过内心世界去解释人性密码；二是得力于论者的哲学理论兴趣，自觉地汲取中外古今人文哲学理论中的有用合理因素，密切结合自己对研究对象的体认与把握，整合出具有相应阐释功能与概括功能的理论思维模式或判断分析力极强的方法论，能够得心应手地从哲学的美学的高度对王安忆其人其文作出合乎逻辑的甚至带有个性色彩的解读；三是得力于较娴熟地驾驭文字的功力，能够运用朴实无华的准确精练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对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理解和认知，既没有故弄玄虚的装腔作势之态又没有华而不实的过度夸张之气，即使有些奇特之见也能老老实实明确确地表述出来，显现出文风的质朴扎实。

从本专著所映显出的研究能量与写作优势来蠡测，淑霞的学术生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只要持之以恒地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下去，一定会结出更多更好的学术之果。是为序。

2008年2月11日(正月初五)

目 次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王安忆的小说观念	(9)
一、写实主义论	(9)
二、自我表现论	(18)
三、虚构本质论	(37)
四、形式内容一元论	(53)
第二章 王安忆小说的主题意蕴	(64)
一、不懈的生存意义追问	(66)
二、悲悯的人生困境凝视	(84)
三、深切的女性生命体认	(97)
第三章 王安忆小说的语言特点	(110)
一、描述性的具体化语言	(111)
二、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	(123)
三、叙述性的具体化语言	(143)
第四章 王安忆小说的美学特征	(154)
一、近距离的性情抒写——清纯明丽	(155)
二、有限距离的理性求索——深沉凝重	(162)
三、远距离的审美观照——平和温婉	(169)

结语	(178)
参考文献	(191)
附录:刘照如小说论	(200)
后记——致谢	(243)

引 言

虽然，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并不完全是由经典作家和艺术大师取得的，而是由一批普通作家努力创作合力而为，众多的默默无闻的普通作家在造就时代文学的同时也成就了那些经典作家，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总结，它总是针对既成的文学事实和历史，总是指向那些经典作家及其文本。在新时期以来的我国作家群队中，王安忆无疑已经位于经典作家之列，而且位居前列。

王安忆是伴随着新时期中国文学一同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并且一步一步散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正如《王安忆说》一书的封面语所言：“从1976年到今天，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秋，当人们回头观望时，会发现，文学的潮涨潮落，始终没有淹没王安忆这个响亮的名字……”

王安忆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步入文坛，至今，她已在文学园地里耕耘了近30个春秋，并且收获了丰硕的果实。迄今为止，她已结集出书70多部，其中短篇小说70余篇，中篇小说40余篇，长篇小说10多部，还有若干散文和文论，合计500多万字。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儿童文学作品《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曾获1980年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本次列车终点》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曾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鲍庄》曾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叔叔的故事》曾获上海中篇小说二等奖，《文革轶事》和《我爱比尔》都曾获上海中篇小说三等奖，《长恨歌》曾获上海文学艺术奖及国内长篇小说的最高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另外，2000年，在100位评论家评出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中，王安忆及其小说《长恨歌》都名列第一；2001年，王安忆当选为《花踪》评选出的

“全球最杰出的华文作家”；2002年，王安忆入选第四届“中国十大女杰”。另外，她的作品《富萍》曾获中国台湾2001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上种红菱下种藕》曾获中国台湾2002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英文版《小鲍庄》曾获美国洛杉矶时代书刊提名奖。王安忆在近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中国作家中实属罕见，曾有论者称她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奇迹”，实不为过。

王安忆的文学创作自然引起了中外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语：“与十五年前相比，甚至与写《长恨歌》的时候相比，王安忆都明显地变了，她真是有一点大作家的气象了。”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语：“她用现实世界的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渐平庸的客体世界，努力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语：“她始终处在‘发现’的状态，对人类、社会与自我都不断有新的发现，因而不断有令人惊喜的探索——这对一切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是一个值得羡慕的状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语：“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细述海上今昔，揣摩世路人情，丝丝入扣，细腻丰饶。女性观看历史的，尤其引人入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语：“一次又一次，她为我们创造了不同的上海和中国，比张爱玲更‘传奇’。”女作家方方曾说过：“就综合实力，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所以，她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学（特别指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可不读王安忆。评论家高芾也曾说过：“张爱玲说过苏青‘实在是伟大的’，这话用在王安忆身上，其实也是不会错的。”

可见，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的文学作品和文本形式，已经“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所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①。可见，王安忆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经典作家，但我们综观批评界对其小说

^① [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创作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针对她的某一作品、某一时段、某一特点的批评是大量的,而对她小说创作的整体性的全程研究则还不够充分和丰富。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王安忆是个多产的作家。如前所述,她辛勤笔耕近三十年,创作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及若干散文、文论,累计达数百万字。近二十年来,她的文字散见于众多的期刊和报纸,然后由不同的出版社结集出书。但是,到目前为止,她的作品没有以完整系统的文集形式出版。所以,有关的研究者要对她的作品进行全程系统阅读也会颇费周折,这就向对她进行全程跟踪研究的批评家的耐心和细致提出了考验和挑战。所以,至今少有对这位拥有近三十年的创作经验、数百万字创作成果、在国内外拥有众多读者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家所进行的整体性的全程研究成果。

形成这种状况的另一原因,更因为王安忆是个多变的作家。正如汪政、晓华所言:“对于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要对其二十多年的创作进行总体性的评论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变化实在太太,如果只能用一句话去概括王安忆的创作的话,恐怕也只能这么说了,她总是在不断地超越,不断地否定,而且这超越与否定又不是在同一个纵向轴上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王安忆总是不能‘一以贯之’,总是不能互相说明,不仅王安忆自己不能说明自己,而且时尚与思潮也不能说明她。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有伤痕、改革、反思、寻根以及先锋(实验)、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新历史、新市民、现实主义冲击波,五花八门,有哪一个思潮能够解释王安忆?”^①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因其创作风格的多样,叙述方式的多变,涉猎题材的多角,价值体系的多元,使评论者很难对她的作品进行归类与总结”^②。因此,综观王安忆近三十年的创作历程,她“不被某一种风格、模式、题材所局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和目标,并且已经给批评界对她的整体研究构成了某种挑战”^③。

①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10期。

② 李泓:《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王雪瑛:《生长的状态》,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

因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多产和多变,致使评论界对其创作的批评和研究远不够充分和丰富。而且,从已经见诸报刊的对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批评和研究成果来看,其中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倾向。一种是求新,即研究者争先恐后引用西方的新潮文艺理论或文化哲学思想对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文本或整体进行阐释和批评。像在所有的领域一样,在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哲学观念无可厚非,它可以发现一个阐释文本的新角度,打开一个批评作品的新视阈。但是,运用新理论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深入,而不是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一味地为求新而求新。而且,正如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所言,文学研究与逐渐进步的科学研究不同,在文学研究领域,旧理论从未因为不如取代它们的新理论而被成功地推翻;文学研究是一个积累性的学科,新知识可以不断补充它,但是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在不再流行的思想也时时都有可能被证明与新的创作方法或批评关注密切相关。况且,王安忆本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新逐异的小说家。她在小说创作中虽然经常尝试创造独特新颖的形式,但其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对文学传统的依循和承继,其小说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她就是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起步出发,一步一步,才走到了辉煌灿烂的今天。因此,一味地引用那些所谓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西方新潮文艺理论研究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未必是适宜的和有意义的。关于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的另一种倾向则是求异,即研究者首先查阅和观看目前对其小说创作研究的资料和动态,然后提出一个与他人的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且旁征博引加以论证。这种一味求异的研究方法与一味求新一样有失偏颇。虽然文学批评和研究更注重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推演,但它也不应该完全脱离和遮蔽感性的体验与领悟,它也应该同文学创作一样立足于自己内心的真正的阅读体验,忠实于自己内在的独特的阅读感受。那种一味地只为求异而求异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浮浅作风,它暗淡了心灵之光的烛照,同样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鉴于有关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的上述情况,笔者从王安忆小说创作

的实践出发,引用与其小说创作密切相关的理论,忠实于自己心灵的阅读体验和感受,试图从宏观上对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行全程研究和整体把握,以彰显其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本书拟采用侧面剖析和焦点透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对于一个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经典作家,仅从一个方面去阐释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多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所以本书截取了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四个侧面进行剖析和研究;同时,这种侧面剖析的研究方法又缺乏一个核心理念,所以,本书又采取了焦点透视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发掘蕴涵于王安忆小说创作各个侧面的核心创作哲学;焦点透视的研究方法也有其不足之处,对此,弗里德曼曾说:“把任何一组特定事物放在焦点上,就必然会使其其他事物退出焦点;突出某一方面的内容,就会使其其他潜在的亮点退居背景。”侧面剖析和焦点透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恰可以弥补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本书从以下四个侧面对王安忆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进行阐释和批评:王安忆的小说观念、王安忆小说的主题意蕴、语言特点和美学特征,并发掘其中所蕴涵的核心创作哲学即中庸创作哲学,从此一特定侧面和角度探析说明王安忆及其小说创作经典化的内在质素。

综观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观念和文本实践,可以发现她的一种核心创作哲学即中庸创作哲学贯穿其中。她在小说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小说的自我表现与超越、小说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等基本理论问题及文本实践中,都表现出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中庸主义的态度和取向。她的这种中庸创作哲学既濡染着中国传统哲学色彩,更富有一种新异的“协同创造”力量,是她面对诸多二元对立的小说理论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包容性和整体性的创作原则,赋予了小说创作实践以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力。

中庸主义是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哲学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等意;庸,有平常、常道等意。“中庸”一词最早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认为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儒家哲学在其著作《中庸》